

# 培养长三角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

江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家园，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基础。金秋十月，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社科联在上海联合举办首届长三角江南文化论坛。专家学者聚焦江南文化传承创新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，就挖掘好、利用好丰富的江南文化资源，推动区域文化的协同发展，持续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，各抒己见。今选编四位学者的观点，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## 文化中心转移重塑城市比较优势

■ 熊月之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）



大运河畅通，河运发达，运河沿线城市便发达；大运河淤塞，海运发达，沿海城市便发达，运河沿线城市便衰落。

古代中国大城市，均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关键节点，都城是一国行政中心，郡城（省会）是一郡（一省）行政中心，没有脱离行政系统之外的独立城市。这是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关键不同。合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，是中国首都功能的常态。南京、杭州如此，长安、开封、成都等曾经作为都城的城市亦如此。在这种格局与传统下，明清苏州、近代上海，作为非首都城市，因经济地位提升而成为江南地区文化中心，就显得

相当特殊了。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前，是普通的沿海城市，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地位均远不及南京、杭州与苏州。开埠以后，上海文化地位迅速崛起，至迟到20世纪初，就已经成为江南文化中心。明清苏州与近代上海，都是合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城市。它们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苏州鼎盛处于中国对外封闭时期，也是河运发达时期；上海鼎盛则处于中国被动对外开放时期，是海运发达时期。大运河畅

通，河运发达，运河沿线城市便发达；大运河淤塞，海运发达，沿海城市便发达，运河沿线城市便衰落。但是，作为合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城市，上海与苏州的形成机理与社会背景却高度一致。它们都处于交通枢纽位置，都处于对海外联系比较便利的位置（尽管苏州不及上海便利），所依托的都是广阔的江南腹地。两者之间，此起彼伏、一脉相承的关系相当清晰。上海开埠以后，其营商环境优越之处，早为敏感

的苏州商人所知晓，特别是1860年以后，苏州危险、上海安全的信息，已成社会常识。于是，苏州商人、文人竞相涌入上海。诚如包天笑所说：“其实上海自开埠以来，最先到的便是苏州商家，当时的大商业，如珠宝业、绸缎业、药材业、参茸业、典当业，以及钱庄、金铺，都是苏州人开创。”包天笑也是由苏州迁移上海的苏州人之一。他的描述，生动地展示了江南地区经济、文化的整体性特点。

### 荐读

《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：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》（杨辰著，同济大学出版社，2019年9月）

工人新村，是20世纪社会主义城市的重要遗产，也是今天上海最具特色的住区类型和城市景观。新村的发生、发展、停滞、衰败与更新，深深地嵌入了1949年以来上海的空间发展和社会变革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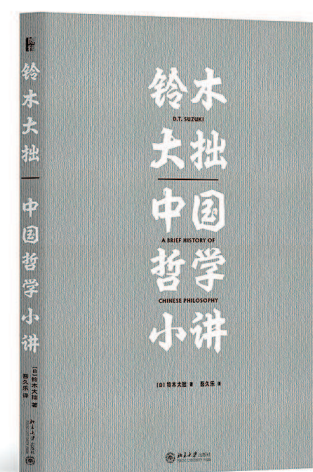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以上海曹杨新村为调查对象，通过梳理其空间与社会建构的过程，着重分析了新村规划在城市、街区、住宅三个尺度上的设计原则，以及两代“新村工人”社会身份的建构与形成机制。



《铃木大拙中国哲学小讲》（铃木大拙著，吾久乐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9年9月）

作为一位影响世界至深的思想家，铃木大拙仅仅用了不到十万字，就从哲学、伦理学和宗教三个面向，勾勒出中国思想史中流光溢彩的发轫阶段所产生的思想激荡。

铃木大拙具有浸淫中国思想日久的东方人对中国哲学的亲近与热忱，深深了解它的价值，同时又能跳脱出来，站在比较哲学的高度，对其分析反省。本书既适合高端读者也适合一般大众阅读，是了解中国哲学的一部非常可读的掌中书。



《思想的力量：中国智库案例集萃》（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编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9年10月）

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在走访各地智库过程中，遴选出15家智库作为经典案例，聚焦其各自的发展轨迹，近距离观察不同类型智库是如何展示其独特风采，并同中国改革与发展联系起来，彰显新时代思想的力量。

该书特色之处在于，能够由点及面探究智库发展内在机理、智库治理结构和智库发展各要素的内在关联。通过典型案例描述树立标杆，较为清楚地回答“什么是智库”、“如何办好智库”、“如何提高智库决策影响力”等一系列问题。



## 活化江南优质审美文化历史资源

■ 陈野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研究员）



江南人文传统积淀深厚，其磨炼出的实践理性、刚健风骨、和合胸襟、务实品格等，是为区域发展厚植根基的常青法宝。

文化是以内聚力维持身份认同、化解社会矛盾、增强社会团结的思想基础和重要方法。构建稳定而有活力的长三角，关键在于长三角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普及与建构。所谓长三角区域文化共同体，是一个包含环境、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传统和文化自身等多重元素的综合体。其内涵就个体而言，关涉个体成员与区域环境相谐的家国认同、与区域社会相通的情感归属、与区域发展同步的自我实现；就区域而言，关涉区域内部各多元主体基于传

统熏陶的文化认同、基于文化认同的理念趋近、基于共同目标的信任互助、共襄盛举，以及作为一个共同体所应具有的合作架构和运行机制，等等。历史传统塑造了江南的区域性整体形象。然而，百里不同风。江南区域内的吴文化、越文化、徽州文化、海派文化，各具历史脉息、文化特质和地域特色。在如今百年未遇之社会大变局时期，江南区域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而易见。加之国内外新移民群体的大量进入，更使

得理念驳杂、文化多元。因此，江南区域内不同地域文化、多元社会主体、多重利益格局以及城市群都市圈等之间的壁垒破除、藩篱清扫、融合共生，都有待于文化发挥其协调整合功能和价值认同机制。江南人文传统积淀深厚，其磨炼出的实践理性、大义凛然的刚健风骨、大气包容的和合胸襟、锐意进取的务实品格、诗性审美的精神气度，是为区域发展厚植根基、敦实人心、磨砺品格的常青法宝。接古通今的海派文化，

红船启航的革命文化，以小岗村大包干、苏南模式、温州模式、昆山之路、义乌现象等改革开放精神为代表的创新文化，基于高新科技的互联网文化，等等，体现了江南文化发展机制与时俱进的效能，是为区域发展接轨时代、淬炼品质、永续辉煌。因此，活化优质审美文化历史资源，提升品质，使之成为长三角作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标杆区域的重要表征，是江南文化和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关系中一个切实可为的领域。

## “江南之路”应当作为思考的起点

■ 程章灿（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、教授）



古往今来，风景不殊，山河不异，变化的是路上行人的眼光与心情。这眼光与心情，跟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及旅行方式是密切相关的。

江南之路有很多种类型，水路、陆路有各自不同的风景。大运河是江南最早的人工水路，是江南文化的重要发明与贡献之一。大运河水路上的重要节点，如淮安、扬州、镇江、苏州、杭州，都依托大运河繁荣发展，确立了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。运河是一条江南性格最为突出的江南之路。江南之路，有内部的盘根错节的脉络，也有向外的四通八达的方向。南下、北上、东出、西行，历代都有。吴泰伯南下，晋室南渡，靖康南渡，康熙与乾隆

南巡，都是南下，都属于官方的大规模的行走。季札的北上出使，吴越的北上争霸，与言子的北上求学，士子的入京考试，亦有公私之别。“还东”“出西”之类词语，往往伴随着“过吴”一词而出现，在建康（南京）、吴中（苏州）和会稽（绍兴）之间勾连了一条东西往来的道路。东晋名士王徽之雪夜访戴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这条路上。这段故事诠释了六朝文化的精神。浙东有一条唐诗之路。实际上，东晋南朝早就有很多文人在这条道路上行走，

并留下很多文艺佳话。这条路将浙东与建康、将六朝与唐代联系起来。没有这条六朝文艺之路、审美之路，便不会有后来的唐诗之路。江南的道路上，充斥着人员的流动，还有大量物资的流动，包括各种日用品、食品以及书籍、拓本、书信等，可以称为“书籍之路”、“拓本之路”等。铁路的诞生，改写了江南的风景与时空，改变了物资以及观念流动的方式。民国时代，奔走于京沪铁路线上的政要名人，构

成了江南的政治文化教育生态。宁波、镇江、杭州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等地之间的时空距离明显缩小，与此同时，不在这条铁道线上的扬州、淮阴，则渐次被遗落在文化带的边缘。古往今来，风景不殊，山河不异，变化的是路上行人的眼光与心情。这眼光与心情，跟他们所选择的道路以及旅行方式是密切相关的。高铁时代，当我们在思考建设什么样的一体化的江南时，江南之路，必须作为思考的起点，必须植入思维的框架。

## 徽商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加速机

■ 王世华（安徽省徽学学会会长、安徽师范大学教授）



对于长三角各大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、基本建设的加快、基础设施的改善、社会秩序的稳定、市容面貌的美化等等，徽商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，安徽就是江南的一部分——明代属于南直隶，清初属于江南省，直到1667年清政府才将江南省一分为二，即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。明清时期，徽州与江南虽然各有不同的区域文化，但两地文化一直是紧密联系、互融互通的。自明中叶（15世纪）起，江南种桑植棉带来丝织业、棉织业的繁荣。丝棉产品亟需广大市场，徽商正是看到了这一潜在的巨大商机，纷纷涌向江南，将丝、布商品运到外地。史载：“布坊各

处俱有，惟阊门为盛，漂染俱精。”苏州阊门一带正是徽商棉布字号最为集中的地方。阊门“益美”字号就是徽商汪氏所设，一年销布百万匹。几百年来，滇南、漠北（泛指今天的蒙古高原一带）无地不以“益美”为美也。苏州枫桥又是最大的粮贸市场，江西、安徽、湖广、四川等省的外销粮食大多运集于此，然后分销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缺粮地区。这里的粮食贸易的主体又是徽商。江南丝、棉织品的输出以及粮食、木材的

输入，都与徽商有重大关系。这一出一进，不仅极大地开拓了江南丝、棉织品的市场，促进了江南丝、棉织业的发展，而且解决了江南长期的缺粮、缺水问题。总之，四五百年以来，长三角城市群是徽商最集中、最活跃的地方，徽商经营的所有行业，在这些城市里都能找到。徽商的活动促进了长三角各大城市的繁荣，无论是南京还是上海，扬州还是杭州，苏州还是湖州等等，都有大批“无货不居”的徽商在此经营。对于这些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、基

本建设的加快、基础设施的改善、社会秩序的稳定、市容面貌的美化等等，徽商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尤其是徽商的活动深入到江南的很多村镇，他们带去了人气，带去了活力，又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，诸如建筑、运输、牙行（中介）、典当、饮食、娱乐等等，催生了一大批市镇，出现了“无徽不成镇”的佳话，从而加速了长三角城市化进程。现在长三角很多县级市都是从当初的小乡村发展起来的。